

5. 例如，本文將要納入考察的《廣州日報》、《羊城晚報》和《南方都市報》都取得了較大的商業成功。其中，2002年，《廣州日報》的年廣告收入為11573.26萬元，居全國之首，《南方都市報》的年廣告收入為5688.50萬元，《羊城晚報》為4564.97萬元。另外，該地區也產生了全國範圍內最具自由和積極取向的報紙，如《南方週末》。
6. 這裏關於「市場取向」的定義是：各報根據市場需求來調整報紙內容的能力。本文對各報「市場取向」的判斷主要來自於筆者的田野考察和相關訪談，這些訪談資料直接得自於筆者在博士論文期間所做的訪談。需要區別的是，本文所說的「市場取向」與所獲得的「市場成功」並不是同一概念。按照我的田野訪談和多方求證，《廣日》和《羊晚》這兩家報紙都取得了較大的市場成功，與《南都》不相上下。甚至《廣日》一度廣告收入居全國首位，超過《南都》，但在本文中，這兩家報紙仍然被界定為「中度市場取向傳媒」，主要原因就是，這兩家報紙雖然獲得了較大的市場成功，但在日常運作中，尤其是在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議題的報道上，卻要受到比《南都》更多的控制，因而不能因應市場的需要而作出報道，其市場取向相對於《南都》因而也更弱。
7. 由於Wiseweb數據庫缺失了部分報紙之部分月份的內容，所以筆者對於該數據庫沒有覆蓋的報紙和時間段，到各報的內部網站搜索和下載加以補充，例如，《廣州日報》的相應數據就全部是通過後一種方式獲得的。
8. 當然，2003年6月19日之後，傳媒仍然對該議題有一些後續報道，但筆者認為，作為一個重要議題，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基本上可以標誌著該議題的階段性完結，之前的新聞文本已經足夠滿足本研究考察傳媒之意識形態立場的需要。
9. 關於農民工之收容遣送的新聞往往伴隨著一些常見語彙，如「盲流」、「三無人員」、「閑散人員」等，在當代中國大陸社會，這些指稱實際上對應的就是「農民工」。所以在搜集新聞文本時，只要報道內容提及關於上述人群的收容或遣送，就被納入考察範圍。
10. 例如，該報在2003年5月17日發表的報道中，就發表了對政協代表黃景均就收容遣送議題的訪談和一篇深度分析報導《收容遣送制度向何處去》，重在為收容遣送制度所出現的問題作診斷。
11. 當然，制度和政策的修正與傳媒報道之間的關聯難以用經驗材料來確證。這裏有兩個理由來支持這一點：一是時間上的順序，這裏提及的兩次政策修正都是於兩次重要的收容遣送事件的大規模報道之後發生；二是記者社區的共識，筆者就此問題訪問過一些參加了此議題報道的記者，他們都傾向於認為政策的修正基本上就是政府對傳媒報道的回應。
12. 來自於筆者對相關記者的訪談。

傳媒越軌的替代性分析框架： 以《南方週末》為例

李小勤

摘要

本文通過考察《南方週末》，中國1990年代銷量最高的週報，對農民與農民工這一邊緣群體的再現，驗證了在報紙的政治話語中折射出的新聞從業者及其修辭作為傳媒越軌的合法化工具。本案例研究在對1984到2002年期間該報對農民與農民工的所有報導的內容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對記者的深度訪談兩種方法，發現傳媒如何將「隱蔽的腳本」滲透進入「公開話語」中。與傳統的社會學分析大相逕庭的是，本研究試圖以一套替代性的分析框架來探討隱含在非民主社會中，存在政治壓力下核心意識形態出現稀釋或衰退的情形下傳媒越軌的問題。

關鍵詞：傳媒越軌、替代性框架、《南方週末》、政治話語協商

李小勤現為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院傳播系助理教授。2005年香港浸會大學傳播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媒介生產與媒介效果，以及廣告效果研究等。電郵：xqli@umac.mo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Media Deviance: The case of *Southern Weekend*

LI Xiaoq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representation of peasants and urban migrant workers as a marginalized social group in *Southern Weekend*, China's top-selling metropolitan weekly. It examines media deviance as reflected in the journalistic and rhetorical devices of legitimization in the weekly's political discourse.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journalists, this case study serves to identify the media strategies that bring "hidden transcripts" into "public discourse". It departs from traditional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media deviance by adopting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is process embedded in political tension in a non-democracy with a dying, or at least diluted, core ideology.

Keywords: media deviance, alternative framework, *Southern Weekend*, political discursive negotiation

越軌 (Deviance) 作為社會學中古老而常新的話題，主要有客觀和主觀兩大相對的視野 (Winick, 1978; 歐蘇利文等著/楊祖珺譯, 1997)，後者更成為其研究主流。主觀視野的越軌，指被部分群體或個人所認定的、尤其是被權力群體所認定或「標籤」(labeling) 的越軌 (Becker, 1963; Goffman, 1959; Pritchard & Hughes, 1997)，是「相對的越軌」(the relativity of deviance) (Curra, 2000)，是「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 (Pfohl, 1994)。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權力中心所界定之越軌，一般較易為絕大多數民眾所認同，但在極權 (totalitarian) 社會與威權 (authoritarian) 社會中則不盡然 (Weitzer, 2002)，在該領域極可能充滿了權力關係的張力和衝突，是權力中心與邊緣的矛盾，本研究之所謂越軌即可歸為此類。但本研究的對象卻不是社會學越軌中常見的行為或群體，而是大眾傳媒，是政治傳播中有關權力的範疇。

從越軌到傳媒越軌

傳媒在政治話語的協商與爭論中越軌

本研究之傳媒越軌 (media deviance) 原意是指微觀層面的傳媒內容的越軌，主要指傳媒披露的被權力中心邊緣化、甚至是在報導禁區之列的事件、議題。具體來說，在中國的情形中，主要就是負面的報導角度 (但不是所有負面的都是越軌的)，並對社會秩序、制度、官僚體制等提出質疑、批評等內容，與現有權力中心意識形態規範產生衝突，因而是越軌、是異常，而且這些報導內容是人為的、刻意的，並非「無意的冒犯」。

由於中國新聞業處於改革的變化發展時期，核心意識形態也在發生某些變化與鬆動 (He, 2000)，從而使傳媒有與權力中心討價還價、進行協商 (negotiation) 的可能，但同時也有了傳媒越軌的可能。其中至少暗含著這樣幾個假設：其一，不是所有的內容都是越軌的，否則的話沒有生存的空間；其二，越軌的內容是為黨政義務宣傳、必須報導之外的「自留地」，或是滲透在義務宣傳報導中假設能為公眾解讀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其三，承接以上，可以推斷出這裡包含著偽裝的藝術。換句話

說，越軌的主要特徵並不在於與權力中心意識形態及其規範的正面抵觸或反抗，而主要表現為「灰色區域」、「灰色話語」的報導；第四，所謂「灰色區域」也呼應了傳媒越軌的主觀視野，是標籤的越軌，「越軌」與「不越軌」之間難以客觀、清晰分界，需要傳媒的精心揣摩與推測，某些時候被權力中心默許了，某些時候卻遭遇對越軌者的懲戒，雙方或可協商解決，經常是傳媒的「檢討」過關，或傳媒或主要編輯記者最終被懲罰出局，直接讓越軌的聲音嘎然而止；最後，承接以上，傳媒越軌在本研究中之原意雖然是指微觀層面的政治話語之越軌，但它也包含了宏觀層面因素的綜合作用，比如政治、經濟因素，比如意識形態因素等等，它們共同組成了傳媒越軌產生的「情境」(context)；而新聞產製過程中的新聞從業者個人、組織因素的直接作用與影響，他們與權力中心之間的爭議與協商，型塑了傳媒的「越軌」形象。傳媒越軌的內容及其動機與影響因素，共同組成了本研究框架中的傳媒越軌。這些，決定了本研究之傳媒越軌與一般意義上的傳媒越軌的本質區別，在文中作者以「替代性」研究框架取而代之。

傳媒越軌的替代性研究框架

一般意義下的傳媒越軌，主要承接社會學中關於「越軌」的研究傳統(見Durkheim, 1938; Merton, 1968)，指傳媒的內容違背了社會的「正常性」之面向的報導，如暴力、犯罪等報導(見(美)Shoemaker, 1984; Shoemaker, Danielian, & Brenlinger, 1991; (英)Winick, 1978; 歐蘇利文等著/楊祖珺譯, 1997; 等)。本研究的傳媒越軌是指在意識形態發生鬆動的非民主社會中，傳媒報導與權力中心意識形態相背離的議題，這些議題卻是權力杠杆劣勢、數量眾多的弱勢群體(the underprivileged)所關心的議題。顯然，權力中心仍然掌握了界定越軌與正常的主動權，但是處於權力邊緣的多數人被推至越軌的角落，在社會階層上淪落為「越軌的多數」(Pritchard & Hughes, 1997)。

與本研究傳媒越軌形式上更為接近的是Hallin (1989)的研究。他在分析越南戰爭期間美國新聞媒介所擔當的角色時，尤其是越南戰爭進入後期美國傳媒出現的一反常態的與共識價值觀相背離的內容，提出了所謂

「共識—正當爭議—越軌」之模式。不過，Hallin的模型雖然在新聞價值的形式上與本研究相近，但在內涵上卻可以說是相反的，Hallin的「共識」正是在民主自由社會中傳媒堅守的社會公眾與權力中心共同持有的價值觀，而越南戰爭後期傳媒價值觀的轉變反映的恰是社會主流的轉變。但是在本研究中存在權力關係張力與衝突的情境下，所謂共識層就不是權力中心與邊緣的共識了，所謂「共識」主要反映的是少數權力中心的意識形態，而越軌層也就是相對權力中心而言的越軌。然而，還需要提醒的是，在非民主自由社會中，所謂「共識」、「正當爭議」與「越軌」並沒有一條清晰可辨的界線，也就是說它們並非互相排斥的(mutually exclusive)。比如說本研究選取的研究樣本：對中國的社會基本階級——農民與農民的報導，對他們權力的維護，這個議題本應屬於社會「共識」的範疇，但事實卻是與這些在中國經濟改革中淪為社會底層的群體的議題；由於對弱勢者權力的呼籲，對部分當權者的追問，也演變為頗有「爭論」的範疇。主流的傳媒在我們研究的期間(1984—2002年)鮮見報導(楊育才, 2003)，更有甚者當報導觸及敏感的權力領域時，傳媒與權力中心協商的權力最終被剝奪，而此前的正當爭議也一併成為越軌的證據。因此，在內容面向的進一步分層中，雖然借用了Hallin (1989)的模式，但其中的界線並不是清晰的，有可能是核心與越軌並存，只是因為說明概念的需要在本研究中仍然沿用了其環環相扣的模式。

社會學者Scott (1985, 1990) 創見性地提出「隱蔽的腳本」(hidden transcripts)和「公開的讀本」(public transcripts)兩個相對的概念，以達到其研究的廣義目的，即如何去解讀、闡釋、理解社會下層組織稍縱即逝的政治意識，那些滲入公開讀本內部的、原本屬於隱蔽腳本的內容，即隱蔽腳本的公開化(Scott, 1990)。這些內容生長的社會空間，本身就是反制的成就，它們在權力「虎口拔牙」(p. 119)，是「統治下的聲音」(voice under domination) (p. 136)，即意識形態的反制如何在偽裝、沈默和暗示下表達。從其研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Goffman (1959)「台前」、「台後」隱喻之呼應，但Scott民俗誌研究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指標。本研究中的傳媒越軌，其實質就是將存在權力關係張力的內容以某種策略進行包裝，瞞天過海，悄然混入報紙的日常報導中，與受制群體的「隱蔽腳本的公開化」有異曲同工之妙(Scott, 1990)。同時在報導背後，還有傳媒與權

力持有者的協商 (negotiation) 策略，比如某些權力持有者事前的默許、暗示，使得傳媒擁有了協商的砝碼；而「違規」後權力持有者的批評與傳媒的「過關」檢討等，讓越軌的戲得以延緩。大眾傳媒在政治話語的競賽中扮演了源頭 (source) 和場域 (sites) 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啟動或呼應了大眾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面在框架競爭中劃分出建制內政治勢力和挑戰者的話語界線。在本研究案例中，《南方週末》(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後) 作為一份政治性話語競爭密集的報紙，其主要的越軌就是集中於此。

至此，本研究的有關傳媒越軌的框架已然浮現(圖一、圖二)。由於與既有的越軌與新聞價值研究所持術語的雷同，在本研究的框架模型建構中，筆者採用替代性 (alternative) 框架模型稱呼之【如沒有特別的說明，下文中傳媒越軌即指本研究情景中的傳媒越軌。作者注】。圖一顯示的是傳媒越軌的結構性模型，即對傳媒產生越軌的主要外界影響因素和關係的描述的模型框架，圖二則是對傳媒越軌的內容面向的操作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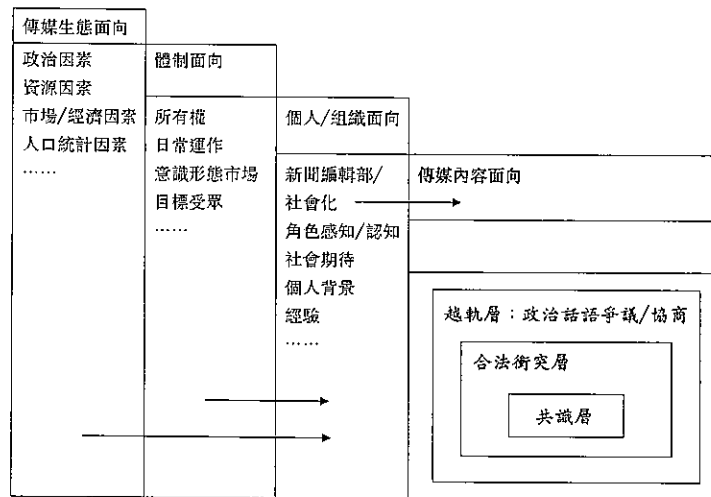
傳媒越軌，在本研究中可以細分為若干面向 (dimensions)。首先是宏觀層面的生態、體制面向。由於在傳媒生態、體制等宏觀面向的急劇變

圖二 傳媒越軌的測量：政治話語作為協商的策略與結果

內容分層	話語性質	作為協商策略與結果的話語
共識層	義務的/必須的宣傳 公開的讀本	內容的主要屬性： 顯在屬性 (位置、尺寸等) 潛在屬性 (報導性質、對事件的追因等)
(合法衝突層)		
越軌層	政治話語的爭議/協商 隱蔽的腳本	

化，比如市場因素的強大「入侵」，導致了意識形態的鬆動以及核心意識形態內部矛盾與張力的出現。由於大量的文獻提供了翔實的研究結果與證據，在本研究中將不再贅述(見何舟，1998；陳懷林、陳韜文，1998；潘忠黨，1998；Zhao, 1998, 2000)。意識形態的鬆動，對社會個人和傳媒組織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比如新聞機構的日常運作、記者的社會化過程、他們對職業角色的認知都發生了變化，而傳媒組織為適應社會的變化，編輯的天平必然向市場、大眾傾斜，而來自權力中心的張力以及其內部衝突也使得作為傳統「黨的喉舌」的傳媒組織，有了捕捉其中「漏洞」的可能，從而在傳媒內容中表現出來。但這種越軌，在傳媒組織本身，並非衝紅線、有意識地對立，他們的本意是推動「正當的爭議」，甚至是對「核心」意識形態的維護。但因為核心意識形態的張力與衝突，多在幕後、是統治階層「隱蔽的腳本」，需要傳媒的推測揣摩，所以這種傳媒的所謂「弦外之音」往往會碰觸到某些「敏感地帶」而嘎然而止。從這個簡單的分析中，我們就能看到所涉及的傳媒越軌各個面向、不同層次之間的互相滲透與影響，也正因為如此，傳媒越軌雖然最終反映在傳媒內容上，但其他幾個面向也是不能忽視的，尤其是與傳媒內容關係更直接的、傳媒組織與記者個人的面向，他們與代表核心意識形態的權力持有者之間對傳媒話語的正當性討價還價及協商。概而言之，傳媒越軌涉及到的最主要三個層面是：1) 傳媒組織；2) 記者個人；3) 傳媒內容的面向。具體來說，這三個層面的內涵非常繁雜，但是與越軌有關的部分卻十分有限，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媒體的情形。比如本研究對象所關注之弱勢群體及其社會問題，在近年中一再被最高權力中心呼籲，已然進入「共識層」，也說明了越軌之有限、稍縱即逝。

圖一 傳媒越軌的結構性模型：影響因素關係圖示



由於本研究中的傳媒越軌採納的是「主觀」面向的越軌，這也就意味著這種越軌是被權力中心「標籤的」越軌。由於意識形態的鬆動，這個標籤更帶有主觀任意性，有些時候甚至被權力中心所「喜歡」，它或暗合了權力中心的某些改革的行動；有些時候這些越軌則是冒天下之大不韙，隨時可能激怒權力中心、甚至被踢出局。在內容層面的測量中，這幾個次級面向的劃分就不是互相排斥的 (mutually exclusive)，一方面帶來研究的難度，尤其是量化研究，但另一方面又帶來研究的樂趣，可以說增加了本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傳媒的內容，作為協商的結果與進一步協商的緣由，研究中主要通過質化的訪談和傳媒內容的話語分析 (後者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本篇中未盡數刊出) 來進行分析。在測量的指標 (indicators) 中，在研究中選擇了《南方週末》對農民與農民工的報導作為內容分析的樣本，其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權力杠杆的衡量，這正是權力最懸殊的雙方；而天生被賦予「黨的喉舌」職能的傳媒一旦將自身定位於「人民的喉舌」之時，張力就可能因此產生。在內容分析的具體指標中，除了有關報導的顯著性 (prominence)，如版面位置、所佔面積等顯在 (patent) 屬性外，更本質的則是報導的立場等潛在 (latent) 屬性，如報導的性質 (正面、負面和中立)、對事件的追因 (社會制度原因、權力持有者的個別原因還是農民與農民自己的原因)，以及報導中消息來源的身份與數量 (權力持有人、農民與農民工和其他人群的在場與缺席) 等，內容分析的側重點就在於圍繞權力杠杆的博弈。

《南方週末》及其農民 (工) 形象再現

在大多數研究者看來，中國的新聞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傳媒的商業化和市場化成為改革的主要特徵 (見潘忠黨，1998；何舟，1998；Zhao, 1998, 2000)。傳媒更多地聚焦於娛樂、奇聞逸事等感性話題，亦即「軟新聞」(soft news)，它們成為新聞報導的主流 (見陳懷林、陳韜文，1998；何舟，1998；Zhao, 1998, 2000)。

但是，我們稍加注意就可以觀察到情形並非如此簡單，主流下暗流湧動。中國傳媒實際上出現的是兩極分化的局面，雖然經濟與政治兩極的數量並不相稱，但是政治話語場域中出現與權力中心意識形態競爭的

異類 (越軌) 傳媒，足以讓權力中心不得不應對、控制。作為案例研究，本文沒有和其他客體進行比較分析，雖有時間、財力的考慮，但也正是由於近年來對中國新聞研究的主流結果可以作為本研究的比較背景，凸顯研究期間 (1984—2002年) 的《南方週末》在中國新聞媒介中突出的「標杆」、「異類」地位 (林楚方，2003；潘忠黨、陳韜文，2004)。

原本定位為機關報娛樂補充的《南方週末》創立於1984年，在中國大陸「一紙風行二十年」，但它卻成長為中國「最大膽」(Zhao, 1998) 的報紙。¹ 標以「人民喉舌」的《南方週末》，常常「為民代言」而不惜揭露部分政府官員或機構的黑暗，而在中國，號稱「人民喉舌」這件事本身就讓權力中心難以接受 (廖聖清、張國良，2003；江迅，2004)，包括報紙在內的大眾傳媒首先應該是「黨的喉舌」。兩種普遍的說法、一個分離的現象，給本研究理論框架的建立提供了某種現實意義的基礎。這種背離、是傳媒職能的異化，必有政治話語的矛盾衝突。

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是《南方週末》對當今中國數量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 (工) 的報導與再現，以此作為政治話語越軌框架的研究載體和指標。中國一向是農業大國，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2005年有近八億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農民工則高達一億，他們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農村收入減少後而離開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作為「中國社會的基礎」，農民本來擁有較高的象徵體系身份，實際上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們也是市場經濟試驗的受益者，但在1990年代以後卻迅速淪落為利益受損者，而且情況不斷惡化，而進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的農民工的狀況也愈加惡劣，在為城市建設出力的同時卻不被社會所接納，成為一群身份不明的人 (陸學藝等，2002)。社會經濟結構上的不合理，帶來數量龐大的不穩定群體，在社會地位上，農民 (工) 實際上被推向了越軌。從社會學的社會階層觀點來看，他們本身就是越軌多數的典型群體。

看似渺小的沈默多數找到了一個代言人之後，他們邊緣化的形象、他們所面臨的問題 (經常源於與權力持有者的衝突) 在被代言的傳媒再現時，是對他們權利的爭取，與權力中心的協商或爭議，對權力中心正當性的挑戰，這是可能令權力中心視為「越軌」而排斥在允許的新聞報導內容之外。無論從中國傳統的核心意識形態還是在社會實踐中，有關農民

的議題絕對不應該是越軌的議題，至多讓他們在傳媒的公開話語中被忽視，但是傳媒的再現不再按照官方的模式，而只是以此作為正當的面具，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揭露他們的象徵體系身份與實際身份的巨大反差，將不能公開的隱蔽腳本公開化了，越軌也才產生。作為一份具有知識分子社會敏感的報紙正以此為吸引其目標讀者之處，並試圖將其正當化：

我們不停為你加油。因為你的希望就是我們的希望，因為你的苦難就是我們的苦難。我們看著你舉起鋤頭，我們看著你舞動鐮刀，我們看著你揮汗如雨，我們看著你穀滿糧倉。我們看著你流離失所，我們看著你痛哭流涕，我們看著你中流擊水，我們看著你重建家園。……我們看著你，我們不停為你加油，因為我們就是你們的一部分。

——《南方週末》編輯部，1999年1月1日

這是一個充滿抒情色彩的傳媒自白。從意識形態立場上看，傳媒是作為弱者的代言人：作為傳媒的「我們」和農民、農民的「你們」難分你我，「因為我們就是你們的一部分」。弱勢者是正當的（勞動中的付出與希望），但承受的卻是更大的苦難（流離失所、重建家園）。苦難是真實的，卻是權力中心不願面對的，他們缺席了，但讀者稍加判斷，卻只能看到兩者的衝突，因而傳媒在此是精心地選擇了權力中心的缺席，這是權力關係的較量。「我們不停為你加油」，傳媒在號召權力邊緣群體的合圍……凡此種種，構成了傳媒的越軌。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傳媒的越軌，起碼在編輯部內部是獲得共識的，記者在不停關注著弱勢群體（「看著」），而以報社名義出現的新年社論（1999年1月1日）則是編輯部最高宗旨，說明這種越軌的產生是有著體制因素影響的，並非臨時的應景之作。

「窺一斑而見全豹」，以《南方週末》作為研究的案例，以農民（工）的報導和再現作為載體和指標，通過傳媒內容（產品）本身的研究，並外推至影響傳媒的宏觀與中觀因素，包括體制因素和組織因素、乃至記者的個人因素等，來研究傳媒越軌的替代性框架應該是有深遠意義和可行的。透過《南方週末》對農民（工）報導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新聞傳媒在

嚴控下求生存與發展的策略，而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新聞體制在1984年到2002年十九年間在開放與封閉間的拉鋸。這也就是為甚麼本研究的樣本類型沒有選擇那些涉及政治腐敗等看似直接挑戰權力、越軌明顯的報導的主要原因。後者的報導，其實多半是在權力中心默許之下的，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經常是「打老鼠而不是打老虎」，或「打死老虎」。即使在某些情況下有可能出現「打大老虎」的情形，但多為偶發，因為極有可能遭到嚴酷的政治打擊，甚至滅頂之災，這是傳媒無意冒險的範疇，也缺乏實證研究所需之普遍性。而《南方週末》為社會地位越軌之邊緣群體代言過程中，為他們的權益討價還價，就時常可能超越權力中心的規範，從而產生對權力中心界定之傳媒專業運作的「規範越軌」、對權力中心正當性質疑的「具改變社會可能性越軌」（Shoemaker, 1984; Shoemaker, Danielian, & Brenlinger, 1991）；傳媒話語中或多或少地滲透著這些越軌，實質就是對權力中心意識形態某種程度的越軌。

其他的實證研究也為我們提供了旁證。楊育才（2003）對中國包括北京（《北京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等7家省級（四川、安徽、廣西、海南、安徽、黑龍江省等）黨報2002年全年以「農民」為標題的報導研究卻顯示，這7家黨報當年的報導總數為1,610篇，平均每報每年發230篇，日均發稿僅0.63篇，其中中國政治經濟中心的北京、上海的機關報的報導數量都不足100篇！而正面消息更高達1,170篇，中國的農業大省四川更是達到79.4%；批評報導僅有6.6%，主要包括犯罪新聞、突發事故以及少量對負面報導進行的分析。在這些黨委機關報中，這些比例微小的負面報導與政治話語談何瓜葛？「三農」問題還有甚麼問題？所以難怪有這樣的結論：「中國知識分子和記者一向懷著精英情結，不信任老百姓的政治能力，甚至敵視工人和農民。不論黨的機關報還是市場取向的報紙，它們責備和壓制弱勢者的情結殊無二致，竟然要求工農擦乾無用的眼淚……」（李金銓，2004：298）。

如果我們看到的黨報和市場取向的小報都是事實的話，那有無例外情形呢？在中國大陸享有真正知識分子代表聲譽的《南方週末》到底是站在哪一邊呢？在對研究對象作簡單理論梳理後，我們總結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是：

研究問題一：傳媒內容中政治爭議話題(越軌)的密度如何？趨勢如何？

研究問題二：傳媒話語的越軌，在報導中是以何種話語包裝策略來實現正當化的？

研究方法

內容分析

由於是個案的類型報導研究，在本研究中將對被邊緣化的農民(工)問題的報導的母體進行內容分析，是唯恐即使再周密的隨機抽樣都可能遺漏某一重要報導而造成偏差，因為《南方週末》本身的特點是以調查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為主，其中的每一篇相關內容報導的失去都可能造成缺憾。加之農民(工)代表的人數巨大，發生在他們周圍的社會、政治問題，將可能直接影響當政者的正當性，其顯著性也足以吸引研究者的目光。

內容分析應該說是檢視《南方週末》十九年來對農民與農民工問題報導的數量、形式、實質等的最佳研究方法之一。在經過新聞報導的主角、體裁這兩項篩選變量的共同作用下，研究者採用關鍵字檢索的樣本為1,153則深度報導、圖片新聞和評論，這也是《南方週末》深得公眾歡迎的主要新聞報導形式；而將「一句話新聞」、短訊等刪除。在內容分析中，我們需要在操作層面清楚界定的概念主要有：傳媒越軌(media deviance)、越軌的正當化(deviance justification)以及與此相比較的共識價值(consensual value)。由於本文篇幅所限，本文內容分析研究的主要指標(indicators)包括：報導性質(正、負或中立)來源、事件的歸因(對現有政策等建制的批評)等等(Douglas, 1992)。這些話語策略，包括在專業主義名義下的各種報導策略，即傳媒越軌的實質及與越軌內容的合法化的手段，正是本研究傳媒越軌概念的操作化。

在編碼者(coders)的挑選與培訓上，本研究挑選的是身處廣州的新聞與傳播學的研究生。經過短期培訓後，在2003年7月中旬，進行了小樣本的試驗性研究(pilot study)，隨機抽取了調查性報導、評論和意見各10

篇，共20篇，計有編碼條目920條，以測試編碼者之間的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測得的編碼者之間的信度Holsti值為90.8%，符合信度標準(Wimmer & Dominick, 2000)。

與新聞工作者訪談

對新聞工作者訪談的目的在於瞭解記者和編輯的工作模式，希望從中概括出越軌的報導策略以及新聞產製過程的影響因素，尤其是記者個人因素和媒介的組織因素的影響，為傳媒話語的分析提供更有力的、直接的證明，並描繪出傳媒越軌更多維的框架與圖景。訪談以半結構式進行，本篇限於篇幅主要報告的是傳媒越軌中的協商、即越軌的表現與正當化策略。

深度訪談對象的最後選定，一是根據他們在《南方週末》的工作時間(1996年以後)，二是他們當時的工作職位(主要的採編主持者)。為了增加有限訪問對象的代表性，筆者最後訪問了9位資深編輯記者，涵蓋報社的主要層次和部門，包括報社中層(部主任)以上負責人4人(含總編輯兩人，新聞部、評論部主任各一人)，記者/編輯5人。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本篇中將採用匿名，以英文字母A-1分別表示，並不公佈其相應的職務。在訪問的方式上，由於一位訪問對象的身體原因，我們採用了電子郵件的訪問方式，其餘的都是面談，120分鐘以上的有3位，90分鐘到120分鐘之間的有4位，餘下兩位為1小時。訪談在2003年12月至2004年4月間進行。

內容分析結果：如何就越軌啦？

負面框架及其凸顯

在報紙的版面安排上，1,153篇報導中出現在報紙頭版的為357則，佔報導則數的31.0%，其中頭版頭條的有238則，其他版面的為796則(69.0%)。從1984年正式創刊的第一期到2002年末的所有985期中，意味著幾乎每三期中就有一篇農民與農民工為主角的報導出現在頭版(表

一)，如果按照負面報導所佔該年度報導總數的百分比來計算的話，我們可以得到一幅更清晰的畫面(表二)。表一中，1992年作為一個拐點，為上一年的10倍之多，這一簡單的算術結果明確地告訴我們這並非擴版的結果，因為1993年才開始擴版。其中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1980年代末以來，外出民工形成新的高潮，在全國出現的「民工潮」是一浪蓋過一浪。如果考慮到《南方週末》報社所處的特殊地理區域：農民工的主要流向地區廣東，則在1992年出現有關農民與農民工報導的高峰，就更順

表一 按年份計之《南方週末》農民(工)報導的凸顯性，1984-2002年

年份	報導則數 (頭版則數)	年度總面積 (cm ²)	報導面積均值 (cm ²)	報導的凸顯 (n = 1,153)
1984	16	4,663	291.4	9,035
1985	12	5,590	465.8	9,580
1986	21	6,709	319.5	12,613
1987	8	2,003	250.4	3,663
1988	9	5,136	570.7	10,272
1989	4	1,183	295.8	2,366
1990	12	4,044	337	8,088
1991	7	2,740	391.4	5,263
1992	35	27,653	790.1	30,587
1993	35	11,428	326.5	17,219
1994	44	17,557	399.0	24,899
1995	48	16,098	335.4	22,711
1996	81	53,284	657.8	75,068
1997	85	38,128	448.6	51,033
1998	132	75,203	569.7	103,307
1999	156	112,234	719.4	133,687
2000	129	103,624	803.3	122,711
2001	150	119,594	797.3	145,696
2002	169	137,035	810.9	153,553
總計	1,153	743,906	645.2	941,351

注1：報導的凸顯的計算方法如下：頭版面積 × 2，非頭版面積 × 1 (參閱Shoemaker & Cohen (2006))。

注2：報紙擴版的年份：4版擴至8版(1993年)、16版(1996年)、20版(1998年)、24版(1999年)、28版(2000年)。這項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報導的凸顯性：雖然報紙的版面增加了，但同時有關農民工的報導，如果沒有更大比例地凸顯的話，至少也在同比增加。

理成章了。我們對報導的面積 ($R = .872, R^2 = .761, F_{1,17} = 54.161, B = 7202.853, p < .001$) 和凸顯 ($R = .880, R^2 = .775, F_{1,17} = 58.570, B = 8505.984, p < .001$) 兩項依年度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就會發現它們與年份顯著相關，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推進，該報對這一主題的報導有明顯增加。

表二顯示，1996年以後《南方週末》刊登的農民與農民工為主題的報導中，負面標題的比重顯著上昇，總計有464篇(51.4%)；而1991年前只佔16.9%，1991-1995年之間為34.6%。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1996年以後該報中不僅有關報導大幅增加，而且主要的負面報導——也就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將出現在1996年以後，更增加了我們將話語分析的樣本和對有關新聞從業人員的訪問將主要集中在這一時段的理據。

在越軌策略(框架)的測量上，對新聞報導中主要要素的方向性判斷是最為主觀的測量，但也是最基本的越軌指標。主要包括「標題的語

表二 按年份之負面標題報導所佔農民(工)報導之比重

年份	負面標題報導篇數	佔該年報導總篇數的百分比(%)
1984	2	12.5%
1985	1	8.3%
1986	2	9.5%
1987	0	0
1988	2	22.2%
1989	1	25.0%
1990	4	33.3%
1991	3	42.9%
1992	15	42.9%
1993	12	34.3%
1994	15	34.1%
1995	14	29.2%
1996	39	48.1%
1997	48	56.5%
1998	76	57.6%
1999	77	49.4%
2000	79	61.2%
2001	63	42.0%
2002	82	48.5%

氣」、「圖片給人的印象」、「農民(工)在報導中的形象」和「新聞報導的性質」等四組，對於這些主觀的變量群，本研究中僅作方向性判斷：正面、中立和負面。在此，所有方向性判斷的標準都是以權力杠杆作為標準的，比如說，正面的農民(工)形象有：權力的受益者、歌頌者等；負面的農民(工)形象則主要包括：(1)被權力持有者壓迫、是苦難承受者；及(2)社會的犯罪、動亂等破壞者、反對者，等等。這兩者之間似乎存在某些矛盾，比如說農民(工)的犯罪與其作為苦難的承受者之間，就有質的區別。編碼中，研究者也考慮到這個因素，不過作為《南方週末》的長期讀者，研究者瞭解農民與農民工經常出現在該報的是在災難事故等社會問題的報導中，並常常成為其中的犧牲者。而應該承認的是這個佔人口近80%的社會階層，在現實中確實也構成中國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楊繼繩，1999)，所以說該報對這一議題的重視，正反映出該報獲得市場成功的內因：抓住了社會的主要癥結。然而該報並沒有採取和1990年代以來其他報紙對罪犯身份的異地化、刻板印象(stereotype)等雷同的處理手段，所以在編碼中為簡化處理將二者並列。結果顯示，在1,153篇報導中，包含事故災難等範疇的社會問題始終是新聞報導的最主要的話題，出現在853篇中；犯罪新聞共出現在356篇報導中，其中犯罪嫌疑人為農民(工)的為214篇(18.6%)。應該說過於簡單化的處理，還是削弱了資料的說服力，這是研究的缺陷所在。但研究者的重心始終在弱勢者在權力博弈中的劣勢地位，正如《南方週末》2001年4月19日刊發的《張君案檢討》系列報導，《南方週末》派出了主管農民問題與政法問題的5名記者以及1名攝影記者，該報導在這一期的報紙中佔據了頭版、2版及3版整版。其時其他各大媒體都競相報導這一「建國以來最大的暴力犯罪團夥」，同時又是農民(工)進入城市後的團夥犯罪的「暴行」，但該報卻將矛頭直指其背後的社會根源，甚至直接以《他們被推到社會邊緣》、《第二個「張君」出現？》等為題。就是這個得到中宣部許可、甚至倡導的報導題材，最終因為受到地方政府的強力反彈，而促使中宣部最終作出嚴厲懲處。《張君案檢討》導致從總編到直接採訪記者的撤職或換崗，直接導致《南方週末》從發展的頂峰陡然墜落，在後來的官方批評中，它被指「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的系列報導。這個例子，一方面它是研究選擇農民與農民工報導作為傳媒越軌研究載體的最終決定因素之一，其次

說明了《南方週末》對待這一弱勢群體犯罪等新新聞題材的立場，最後也說明在核心意識形態空心化的情形下越軌與不越軌確實帶有極大的主觀、任意性。

分析結果(表三)顯示，這幾個越軌策略的方向性指標中負面的比例都是最大的。其正面比例之低，最多不到17%，令人驚訝。時任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的趙啟正2003年夏在莫斯科訪問時，公開對CNN、BBC等國際傳媒作出批評，他指責這些國際傳媒「報導不夠客觀」，「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理由就是在中國大陸完成的一份調查統計數據，指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有五成是負面的、三成是中性的，「只有兩成是正面的」(中央社台北2003年8月24日電)。而在此，體制內的傳媒負面報導接近七成，再與黨報十年後正面報導高達八成的研究結果比較(楊育才，2003)，說明該報的越軌傾向性之強：對「正面宣傳為主」的黨的新聞工作原則的某種背離。另外，一般意義下「新聞是權力的產物」(Shoemaker & Reese, 1996)，而對較弱勢的、社會地位越軌的群體，則更加污名化，進一步削弱他們的影響力，在媒介報導中他們是「未經批准的罷工者、都市的騷亂分子、依賴福利謀生的母親、學生中的武裝分子、極端分子和不可救藥的反動派」(Paltetz & Entman, 1981)。然而《南方週末》的「守門人」卻採取大相徑庭的策略，從而有了某種意義的「越軌」。

表三 越軌策略的方向性判斷變量類次一覽表

	正面	中立	負面	小計
標題的韻氣	104 9.0%	514 44.6%	535 46.4%	1,153 100.0%
圖片給人的印象	75 12.0%	210 33.5%	342 54.5%	627 100.0%
農民(工)在報導中的形象	94 8.2%	276 23.9%	783 67.9%	1,153 100.0%
新聞報導的性質	195 16.9%	192 16.7%	766 66.4%	1,153 100.0%

實質的越軌：與權力中心意識形態背離的歸因

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越軌更本質 (substances) (Guo, Fung, Li, & Ng, 2002) 的表現就在於事件的歸因，突出顯示傳媒的立場，它是對事件的解讀 (interpretation)，並提出問題和結論等。

在本文中我們僅以報導中的「批評主題」作為傳媒對事件歸因、越軌實質最重要指標。針對制度、國家機構、政策等權力中心的制度、政治性主題佔大多數，在854篇有效個案中一共出現1,958次，其次是以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為代表的社會現狀，出現605次；對傳統陋習的批評最少，109次。我們不妨再作一個簡單的歷時性分析則可以明顯看到以下幾個特點：其一，1992年和1996年是兩個值得特別關注的時間，1992年以前有關報導的批評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1996年後的報導的批評性更加顯著上升；其二，在報導的批評性有所上升的1992-1995年期間，主要的批評既表現在對政治、政策的批評上，還有一個幾乎並駕齊驅的面向就是對傳統陋習的批判，而我們知道農村、農民經常在文化上作為傳統的象徵，中國文人批評的所謂「傳統陋習」的主要載體，在1992年至1995年期間中國改革高調前進的幾年中，農民的角色在《南方週末》中並不那麼「討好」，但1996年以後批評的矛頭則更多地指向政治與政策。在歷時性的分析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傳媒從共識到合法爭議到越軌的嬗變過程。

至於在報導中為甚麼能夠作出與權力中心意識形態相背離的歸因，除了「守門人」的立場的決定作用外，在專業策略上在消息來源的取捨方面，報導中已經作了細緻的鋪墊。在所有樣本中，官方消息來源的總數為1,550人，非官方消息來源的總數為1,966人，官方消息來源佔所有消息來源總數的44.1%，而非官方消息來源的人數比例是55.9% ($\chi^2 = 283.70$, $df = 140$, $p < .001$)。來自主流的研究發現官方消息來源在新聞的產製過程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幾乎高達四分之三 (見Gans, 1979；臧國仁，1999)。在本研究中則非官方消息來源多於官方消息來源，這種「民本」的立場，同時在表現形式上也似乎與西方傳統的新聞價值判斷產生了頗具意味的「背離」。在測量消息來源的越軌中，更為突出的是不支持或反對權力中心或政府立場的非官方消息來源的數量。在335篇報導中共有781

人，佔所有非官方消息來源1,966人中的39.7%，平均為2.3；與權力中心持異議的「異類」官方消息來源只出現在274篇報導中，共有478人，佔所有官方消息來源1,550人的30.8%，平均為1.7人 ($\chi^2 = 231.73$, $df = 42$, $p < .001$)。在這些報導中處於權力關係杠杆弱極的一般市民、尤其是農民與農民工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其中有超過30%的消息來源明確站在權力中心的對立面。這在「以正面宣傳為主」作為新聞工作原則的中國新聞界，是十分罕見的，舉現其「人民喉舌」的功能。

表四 消息來源的數量以作者分類的均值檢驗

	作者	平均值M	標準差SD	t 值
非官方消息來源數量	非本報記者	1.2	1.7	9.01***
	本報記者	2.2	2.0	
非官方消息來源中異類的數量	非本報記者	.3	.8	12.01***
	本報記者	1.1	1.6	
官方消息來源數量	非本報記者	1.0	1.5	8.09***
	本報記者	1.8	1.7	
官方消息來源中異類的數量	非本報記者	.2	.7	9.12***
	本報記者	.7	1.0	

*** $p < .001$

採用T-檢驗來驗證「本報記者」與「非本報記者」與所引述的消息來源數量的區別 (表四)，發現這兩類作者在採用：非官方消息來源 ($t(1151) = 9.01$, $p < .001$)、非官方消息來源中異類 ($t(1151) = 12.01$, $p < .001$)、官方消息來源 ($t(1151) = 8.09$, $p < .001$) 以及官方消息來源中異類 ($t(1151) = 9.12$, $p < .001$) 的數量等四項檢驗中均存在顯著差異。所有四項檢驗中，「本報記者」所引述的消息來源數量都明顯高於「非本報記者」。也就是說研究機構內外的不同記者之身份對消息來源以及「不同聲音」的消息來源的採納的數量之間存在顯著區別，「本報記者」更注重多方消息來源的採納，更趨向平衡。

這些傳媒的守門人，精心選擇了那些消息來源的在場或缺席，讓弱勢者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在協商理論 (negotiation theory)，還是在傳媒研究中，傳媒經常扮演正名者 (legitimator) 的角色，它有權宣佈個人、

組織、協商者和事件的正當性，經常是對體制內的物件而言 (Olien, Tichenor, & Donohue, 1989)。但在本研究中，研究對象對權力邊緣的弱勢群體——常常被權力機構有意或無意淡化其正當性的群體——不惜喋喋不休地宣佈其正當性，為其宣示權利：他們本應有的但失去了的。因此，從廣泛的理論意義上，研究對象也是一個「越軌」的傳媒。

傳媒越軌的包裝策略

一般而言，傳媒作為「正統的維護者」而成為權力協商中「欣喜的第三者」(tertius gaudens) (Arno, 1984; Douglas, 1992; Simmel, 1950)，但作為一個越軌傳媒其角色在權力中心那裡已然變色，只不過傳統意識形態鬆動了，給了它乘虛而入的機會與空間，越軌傳媒卻因此要遭受巨大的政治壓力。在訪問中，傳媒從業者就給出了與理論假設驚人地相似的證據。

在中國進行輿論監督的《南方週末》自1995年以後就「一直有壓力」(A, 訪談資料, 下同)，之前當然也有，但沒有後期如此鮮明。遭到強烈反彈的根源主要有兩大塊：

一是「封疆大吏」，你到某個省去搞批評報道，在別省的省報不出來的新聞在你這裏報出來的，這也是後來《南方週末》遭受一連串打擊的一個根源所在。……再一個就是部委辦這條線，像鐵道部的、衛生部的，消費者維權這一塊已經觸動了許多利益集團，已經觸痛了他們 (C)。

而報紙感受到的具體壓力則多表現在中宣部系統內的「閱評」制度上，這是對官方「公開讀本」嚴格控制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常見的一種是斷章取義式的「道德」批判，比如說從某些細節、用語等就下結論「傾向不好」(C)；其二是所謂「槍打出頭鳥」，對發稿標準的主觀認定，其他地方可以發的稿件，對「領頭羊」嚴厲看管不能發 (D)。訪問中，D以「背後盯著你的那雙眼睛」來隱喻閱評審查制度，而在談到一些被批評的個案時，訪談物件們經常用到的一個詞就是：「犯忌」。傳媒的越軌，對權力中心而言就是在犯忌，是將本該屬於「隱蔽腳本」中的內容公開了，這些冒犯

者一般是在行為實施之後被權威者宣佈為犯忌，而這個標準對於經常犯忌的傳媒就更為苛嚴了，2004年《南方週末》是中宣部重點監控的50家傳媒之一 (D)。

傳媒工作者由於「犯忌」而經驗豐富，因此權力持有者雖然「總是拿你沒有辦法」(B)，卻因而格外加固對其的控制，所以權力的弱者最終很可能要為此付出代價的：對於越軌過多、過於嚴重的人，權力中心最後的辦法就是「拔刺」，公開點名免職，這被《南方週末》的人自己笑稱是「點殺」。這樣一個力圖衝突權力禁區的傳媒，無不在精心地探索「天花板」與「警戒線」到底在哪裡。換言之，傳媒從業者在揣摩、預期與權力中心協商的底線在哪裡、結果會如何。

雖然新聞報導中越軌正當化策略的研究重點在批判的話語分析中體現，已超出本文範圍，但是訪談中來自新聞從業者本人所總結的日常運作中的策略，對我們動態地看待權力張力下的越軌及其正當化包裝，也很有意義。

在權力「保護傘」下的協商

無論在「封疆大吏」，還是在各部委辦那裡，一個地方報紙是不具備足夠協商資格的。但是正是這種封疆大吏的統治現實，權力中心核心意識形態的「空心化」(何舟, 1998)，使得「週末」在1999年以前，獲得了有效的權力保護傘，也使得受制方的隱蔽腳本有了生存的空間，在必要的面具之下從而開展「日常的反制」(Scott, 1990)。

那時候 (1999年前)「開明」的廣東省領導對「週末」的保護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 (C, B)，比如當時的廣東省委領導利用自己在黨內的權力，親自努力化解了《南方週末》1993年衝線報導「製警案」(當年公檢法都是報導禁區)而引致的停刊風波，將中宣部業已發出的停刊通知減輕變成了整頓。這個例子筆者在對幾位的訪問中反復聽到。這是高層權力之間背後的斡旋，「都可以寫成一本書了」(C)。當時的廣東省委宣傳部還經常打電話給報社通告最近的「風聲」，它無意中也成為廣東官員們手中有用的棋子。但訪問對象們顯然不願意用這樣的觀點來反觀於保護過他們的原省級領導，他們寧願將這些領導視為「平民的領導」，在「共產黨最開明的官

員之列」(C, B)。這些觀點也說明「週末」記者們並無對立主流意識形態的原意。

在這樣一種權力關係的生存條件下，一個越軌傳媒的確需要權力蔭護中的生存空間，很難想像沒有權力保護傘的、對權力中心進行話語協商和爭議的越軌傳媒的長期存在。

「紅燈停」

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廣東省內部曾流傳一個經驗，就是「見到紅燈才停」，暗示著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情況下都往前衝。這種「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為廣東的經濟起飛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同樣的經驗在《南方日報》報社內部也受到報社「老總們」的重視和傳授，他們利用自身在黨報豐富的工作經驗，將「生存之道」在報社內部的學習討論中經常與包括「週末」在內的子報的主編們進行經驗交流：

禁令沒有下來之前你趕緊做，做足它。禁令一下來你再做，就是違禁的問題，違禁的處理就非常嚴厲的。禁令沒下來之前只挨批，挨批還可以改。老總們也是摸透了這個，傳授時也是給大家講這些東西。這些老總們的生存之道總結一下，也是很有意思。……他也跟我們經常講課，你既要勇敢，但也要讓上面容忍，你要掌握它的容忍度在甚麼地方，就這樣不斷向前拱，就這樣一個思路(C)。

在這種思路下，考量傳媒的越軌，自然不是非黑即白如此簡單了。越軌，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都不能簡單等同於意識形態的對抗，是「犯忌」而不是「違禁」。有明令禁止的東西，大家都不會去碰，「那是找死」(B)。但有一些東西，在這些沒有充分話語自由的新聞從業人員心中也非常明白是在衝線，但是他們會去「探險」。這種做法究竟越軌與不越軌，就在權力中心的一念之間了，這在權力弱勢方就是一種討價還價的策略。

「首發」、「獨家報導」在1990年代中後期成為《南方週末》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這裡講的就是時機的問題。《南方週末》的市場優勢在於此，而她的風險也隨之而來。研究樣本中大量出現的農民與農民工報導，這

在當年的中國傳媒中是罕見的。而在2003年後，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直接倡導下，傳媒開始可以大量報導此類問題(但研究證明(楊育才，2003；李曉紅，2004)它們並沒有賣力地做)，而《南方週末》同樣的問題早已「做透」了。從大方向來說，這一類報導的風險並不太大，因為農民(工)的問題當時根本沒有進入權力者的視野，但是《張君案檢討》(2001年4月)對農民犯罪團夥的另類報導則犯了大忌而被重罰，導致「全軍覆沒」。

「打土圍子」

這個提法出自《南方週末》創辦時期的主編左方。在權力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權力弱勢方對自己在協商中的預期結果的自覺下降，從而尋找一些既讓權力中心可以忍受的，又很有典型意義的小的「土圍子」：封建的、但容易攻破的小地方的案例來做，「一個一個的土圍子去打，大的東西你不一定去硬碰」(C)。類似的說法，在被調查對象中還有「堤防建設」、「警戒線」等等。

這也可以間接說明反映農民問題的報導在「週末」中的密度為甚麼會如此之大，因為農民的問題經常就發生在千萬個「土圍子」之中。但報社對「典型意義」的重視，則應該視為其越軌策略的一種隱含而曲折的表現，傳媒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推翻一個個的「土圍子」，而是借助這些其可以越軌的區域，通過其中反映出的「典型意義」來達到受制的弱勢者更大的利益，「一步一步地向前拱」(C)。所以「土圍子」也越打越大，《張君案檢討》自不必說，其他的案例也一再出現，《南方週末》就屢屢遭到在某一地區被「惡意收購」的命運(A)。

「見木不見林」

即使在對「土圍子」進攻的時候，在新聞報導的具體操作也得有專業策略的講究。在報社內部也經常有策略、方式方法的探討(A, C)。這一點，「週末」的穩健派們十分注意，也符合專業主義的包裝策略：事實與意見既隔離也必須相關。對此，在訪談中，A詳盡地談到了報社內部的「四不政策」：

我們有規避風險大的原則：「堤防建設」，警戒水位。通常是：見木不見林，拿案例說話。不顛覆制度，不對抗政府，不用報紙直接挑戰執政者的地位，不做整體的否定。與管理力量之間有技巧，博弈的關係，時鬆時緊。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係。眼前的利益是要表達，如果能表達七分，你只表達了四分，就是失去責任。過線，則遇到危險，長遠的利益被剝奪(A)。

E也反復強調所謂「積極的批評」，但無論怎樣，在「專業主義名義」(Tuchman, 1978)下的越軌，行為者自身看來是「政治正確」，所以甘願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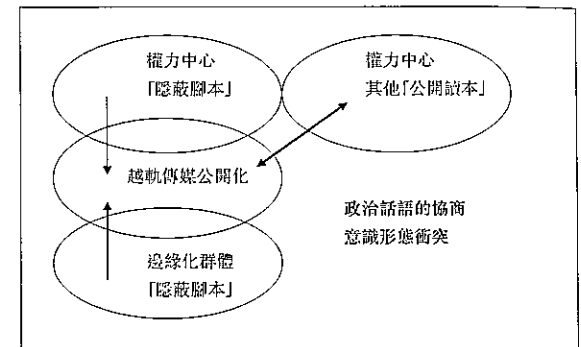
結論

無論傳媒採用何種越軌策略，對它如何進行正當化的包裝，其實質莫不在於傳媒在權力上的越軌，覬覦權力中心所允許的權限之外的額外權力，主要就表現在對受眾、民意的爭奪。尤其是在權力中心意識形態發生危機、淡化或分裂之時，傳媒不僅有來自權力中心的某些蔭護，更持有人民的名義——直接的策略就是在報導中大量採來自「他們」的聲音，因此而獲得協商中重要的權力砝碼。虛弱的權力中心不願看到、也很敏感的是，那些大眾傳媒在這些「政治正確」包裝下，將「隱蔽的腳本公開化」(Scott, 1990)，從而弱化了統治權力的正當性(圖三)。

我們看看關於讀者來信欄目，閱評者和報社是如何爭鋒相對地進行討價還價的。權力中心最後還是將這個場域在傳媒徹底地抹掉了：

讀者來信，……有些很好的文章就是這樣發出來的，但是審讀員的鼻子很靈，他就嗅到那裏味道不對，講了好多次。我們後來把名字改了，我們原來叫「讀者心中的南方週末」，他就覺得你《南方週末》老是在讀者心中，這個名字讓他痛苦。後來叫「讀者心聲」、「編讀往來」，改過了好幾次擡頭的欄目名稱，最後都沒法生存，只有砍掉了。但是作為媒體與讀者的互動，《南方週末》是做得比較充分。對於這樣很自覺地認為自己是啟蒙的媒體，是大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個橋樑的媒體，把它作為一個很重要的通道，這樣去交流，有意識地去做這個事情(C)。

圖三 傳媒越軌的權力機制



「要有承擔的，報紙對社會要有承擔」，A和E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說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話語。這種承擔是需要有付出的勇氣的。從左方1990年代初期的「思想啟蒙」，呼應了當時思想界的啟蒙思潮；到1996年開始的江藝平的關懷弱勢的宗旨，以及在操作中秉承的「社會責任、參與者」等做法，與19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又不謀而合。自由主義的思潮是以溫和而著稱的，但近半個世紀以來它在中國卻常常被權力中心視為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競爭者(李金銓, 2004; 江迅, 2004)。這種對時代主流(指在人數上的考慮)的思想和脈動的準確把握，不能不說在客觀上成就了《南方週末》，但也意味著她對核心意識形態的某種越軌。

參考文獻

- 江迅(2004年12月19日)。〈中國知識界又面對寒冷的冬天〉。《亞洲週刊》，頁32-35。
- 何舟(1998)。〈從喉舌到黨營輿論公司：中共黨報的演化〉。何舟、陳懷林(編)《中國傳媒新論》(頁66-107)。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出版。
-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李麗紅 (2004)。〈弱勢社群的公共表達——當代中國市場化條件下的城市報業與「農民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論文。
- 林楚方 (2003年10月8日)。〈南方週末記者林楚方致張東明總編的公開信〉。取自星辰在綫，http://www.csonline.com.cn/pinglin/xingchenwangyouretie/t20031008_29421.htm。
- 陳懷林、陳韜文 (1998)。〈烏籠裡的中國新聞自由〉。何舟、陳懷林 (編)，《中國傳媒新論》(頁50-65)。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出版。
- 陸學藝等 (200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楊育才 (2003)。〈黨報關於農民報導的問題及對策——對7家省級黨報農民報導標題的議程設置分析〉。《新聞大學》，第三期，頁75-78。
- 楊繼繩 (1999)。〈中國當代階層結構總體分析〉。《中國社會學科季刊》，1999年秋季號，頁119-128。
- 廖聖清、張國良 (2003)。〈甚麼是新聞：對中國新聞媒介的內容分析〉。張國良、黃芝曉 (主編)，《資訊化進程中的傳媒教育與研究》(頁139-15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臧國仁 (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書局。
- 歐蘇利文等著、楊祖珺譯 (1997)。《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台北：遠流。
- 潘忠黨 (1998)。〈大陸新聞改革過程中象徵資源之替換形態〉。《新聞學研究》，第54期，頁111-139。
- 潘忠黨、陳韜文 (2004)。〈從媒體範例評價看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的範式轉變〉。《新聞學研究》，第78期，頁1-43。
- Arno, A. (1984). The news media as third parti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uobus litigantibus terius gaudet. In A. Arno & W. Dissanayake (Eds.), *The news media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p. 229-238). Boulder, CO: Westview.
- Becker, H. S. (1963).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Curra, J. (2000). *The relativity of devia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ouglas, S. U. (1992). Negotiation audiences: The role of the mass media. In L. L. Putnam & M. E. Roloff (Eds.), *Communication and negotion* (pp. 250-272). Newbury Park, CA: Sage.
- Durkheim, E. (1938).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S. A. Solovay & J. H. Mueller, Tra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ns, H.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case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Guo, Z., Fung, K., Li, X., & Ng, I. (2002, June). *First come out is a rotten egg: A dynamic typography of China's media content in the reform er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Hawaii.
- Hallin, D. (1989).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 Z. (2000). Working with a dying ideology: Dissonance and its reduction in Chinese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 599-616.
- Olien, C. N., Tichenor, P. J., & Donohue, G. A. (1989). Media coverage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C. T. Salmon (Ed.), *Information campaigns: Balancing social values and social change* (pp. 139-163). Newbury Park, CA: Sage.
- Paletz, D. L., & Entman, R. M. (1981). *Media-power-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 Pfohl, S. (1994). *Images of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A sociological history* (2nd ed.). New York: MacGraw-Hill.
- Pritchard, D., & Hughes, K. (1997). Patterns of deviance in crime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7(3), 49-67.
- Scott, J.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hoemaker, P. (1984). Media treatment of deviant political groups. *Journalism Quarterly*, 61, 66-75, 82.
- Shoemaker, P., & Cohen, A. (2006). *News around the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hoemaker, P., Danielian, L., & Brenlinger, N. (1991). Deviant acts, risky business and U.S. interests: The newsworthiness of world events. *Journalism Quarterly*, 68, 781-795.
- Shoemaker, P., & Reese, S. (1996). *Mediating the message*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
- Simmel, G.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K. H. Wolff, Ed.). Glencoe, IL: Free Press.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Free Press.
- Weitzer, R. (Ed.). (2002).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A reader*. Boston: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Wimmer, R., & Dominick, J. (2000).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6th ed.). New York: Wadsworth.
- Winick, C. (Ed.). (1978). *Deviance and mass media*. London: Sage.
- Zhao, Y. (1998).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Zhao, Y. (2000). From commercialization to conglome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res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Party stat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pring, 3-26.

註釋

1. 雖然大膽的報導給報紙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但由於壓力和風險太大而客觀上造成《南方週末》獨步天下的態勢。根據本人在《南方週末》報社調查得到的數據顯示，該報的規模在1990年代獲得了裂變似的激增。從1984年到1992年，《南方週末》處於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1992年的發行量最大為74萬份，而報紙版面則維持在4版，和當時其他的中國報紙相似。從1993年開始，報紙版面從4版擴至8版（1993年）、16版（1996年）、20版（1998年）、24版（1999年）、28版（2000年），甚至年終特刊的36版（2000年12月28日）。同時發行量也猛增，到1998年後最高達到130萬份，1999年至2001年發行量一直穩定在每期100萬左右的水準，《南方週末》成為中國發行量最大的綜合性週報。當時它的廣告量在同類週報中也最大，以1999年為例，其廣告營業額為9,470萬元，而2000年是《南方週末》收入最好的一年，廣告營業額超過1億元，達到最高峰，利潤超過4,000萬元。故有「標杆」之稱。

鳴謝

作者首先要感謝《南方週末》曾經與現在的編輯記者們，沒有他們便沒有今天的這個研究。本文主要框架取材修改自作者在香港浸會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2005），本人對朱立教授和郭中實教授的悉心指導深表感謝。作者也十分感謝《傳播與社會學刊》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

廣告話語的結構重疊和中國社會的變遷 ——以1980年和2000年《人民日報》的 廣告為例

馮捷蘊、吳東英

摘要

本文採用批評話語分析的視角及其話語結構重疊的理論，研究分析了1980年和2000年《人民日報》的廣告文本，考察其話語結構的重疊及變化和社會宏觀結構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1) 1980年和2000年的廣告同屬於商業性的公眾話語，但前者混有政治化的話語結構，而後者則夾雜了私人化的話語結構；2) 1980年的廣告表現為信息性語體結構為主；而2000年的廣告則更多地表現為信息性語體和感染性語體結構的重疊。本文指出：中國廣告話語結構的重疊及其變化反映了過去二十年間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具體說來，是整個社會從政治的泛化走向消費者至上的消費社會的表現，也是廣告業從初級階段走向較高階段的表現。本文希望通過考察話語結構的重疊及其變化為宏觀社會研究或者社會變遷研究提供一個微觀的語言學視角，並嘗試對批評話語分析的話語結構重疊理論提供一個實證及量化的分析方法。

關鍵詞：話語結構重疊理論、信息性語體、感染性語體、政治化話語、私人化話語

馮捷蘊，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博士研究生，之前在廣州中山大學獲英語功能語言學碩士學位。目前博士研究課題為廣告話語和中國社會的變遷。主要研究興趣為：媒體話語與社會，當代中國與新興話語。

電子郵件：wendy.feng@polyu.edu.hk, fengjieyun@21cn.com

吳東英，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是傳播語言學、本土全球化 (glocalization) 與媒體語言的結構重疊和變異。

電子郵件：ctdwu@inet.polyu.edu.hk